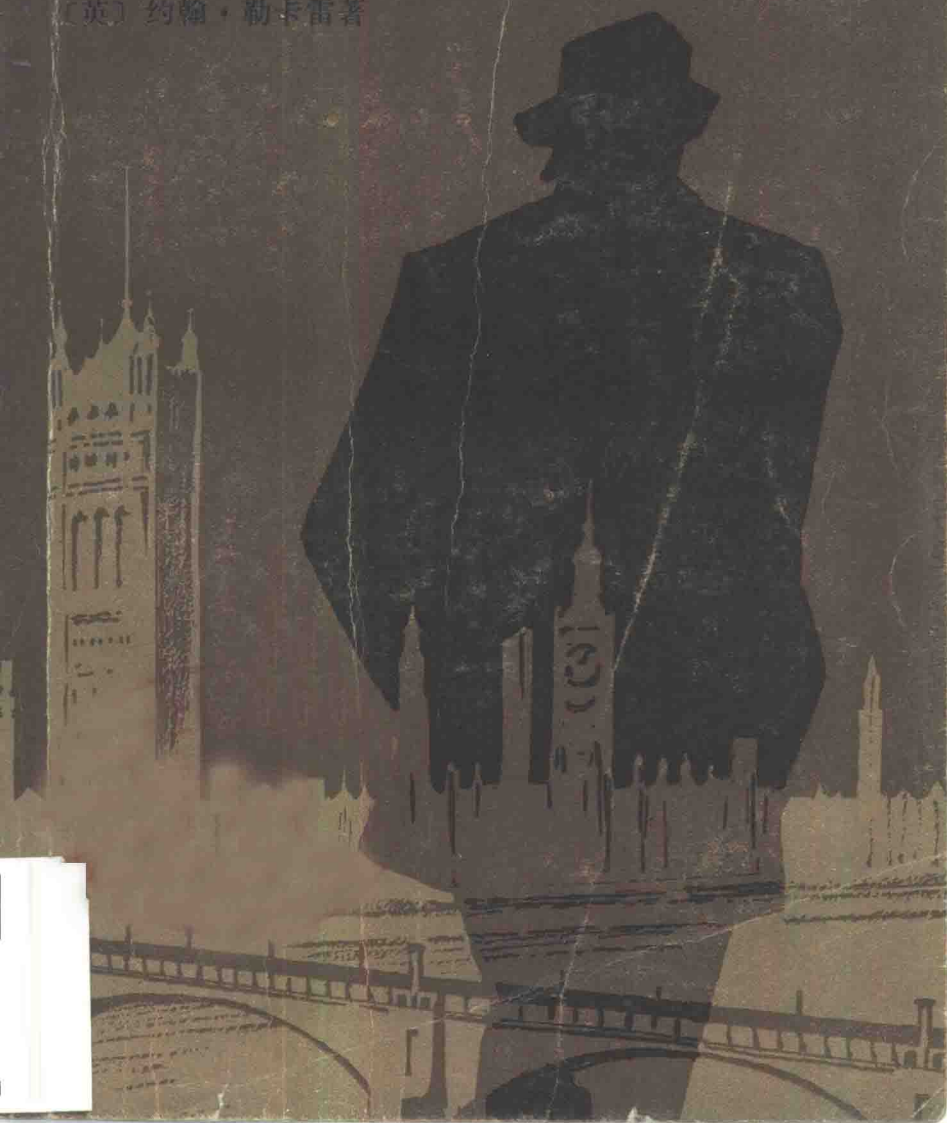


伦敦谍影

〔英〕约翰·勒卡雷著



伦敦谍影

(英)约翰·勒卡雷 著

施 华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SMILEY'S PEOPLE

JOHN LE CARRE

本书根据纽约艾尔弗雷德·诺夫公司1980年版译出

伦 敦 谍 影

(英)约翰·勒卡雷 著

施 华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300,000字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重庆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03·048 定价：1.10元

表面看来并无联系的两件事情，预示着并非真正退休的乔治·斯迈利先生要应召出山。第一件事的背景是巴黎，正值酷暑的八月。在八月，巴黎人一向要离开那烈日炎炎的巴黎市，尽管街上有一车车随旅游团前来的游客。

八月的一天——八月四日，时间是十二点正，因为工厂刚打过下工铃，教堂的钟就有节奏地响了十二下——，在一度由于有许多穷苦的俄国流亡者而著名的一条街上，一个年约五十的矮胖妇女手拎购物提包，照例很带劲地从一家阴暗的旧货栈里出来，沿着人行道走向公共汽车站。这条街灰暗，狭窄，两边房子的门窗紧闭。它有两家古老的旅馆和许多猫。由于某种原因，这个地方特别僻静。这个货栈经营的是易腐物品，所以假日仍然开门。这天微风不动，夹杂着汽车排出的废气的热气，象来自升降机井的热浪一样向她袭来，但她那斯拉夫面孔上并无抱怨的表情。她的衣着和体格都不宜在热天使力气，她的个子着实矮小肥胖，走起来得蹒跚前进。她穿着朴素的黑色衣服，既无腰身，又无其它吸引入之处，只是脖子上有一条白色项链，胸前挂一个大金属十字架，由于经常用手摸抚，十字架显得锃亮，但无内在价值。她穿一双

破皮鞋，走起路来脚趾都快要露出来了，在两边是关门闭户的房子的街道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她那破旧提包从清晨起就装得满满的，但她的身子稍微向右倾斜，这说明她已习惯于拎重东西了。不过她也有一些有趣之处。她的灰发在脑后结成一个髻，蓬松的前发在她蹒跚前进时却披散在额前，她的棕色眼睛发出幽默的光芒，宽下巴上面的嘴，只要有一点点理由，看来随时都准备嫣然一笑。

到了她常去的公共汽车站以后，她放下提包。用右手抚摩与脊骨相连的臀部。近来她经常这样抚摩，虽然这并未减少她的痛苦。她作为检查员每天上午在货栈工作，那里的高凳子没有靠背，她越来越对这个缺陷感到气愤。她低声对她感到痛楚的那个部位抱怨说，“魔鬼”。她抚摩一阵这个部位以后，就把黑色的双肘放在身后，活象准备飞起的老乌鸦。“魔鬼”，她又说了一遍，这时，她突然觉得有人在注视她，于是转过身来，仰面盯着身后的一个胖高个子。

他是等候公共汽车的仅有的另外一个人，事实上，在当时，他是这条街上仅有的另外一个人。她从来没有跟他搭过腔，可是他的面孔却是她所熟悉的：那么高大，心情不定，满脸是汗。她昨天看到过他，前天看到过，据她所知，大前天也看到过他——天哪，她并不是活日记呵！在过去三、四天里，这个虚弱的、有所渴望的巨人在等候公共汽车，或者是在货栈外面的人行道上徘徊，对她来说，他已成为这条街上的一个人物了，而且，这是一个可以认出的人物，虽然她并没有同他打过招呼。她觉得他象是被搜寻的人，近来，许多

巴黎人都象是被搜寻的人。她从这些人的脸上，从他们在走路时不敢彼此打招呼这一点，看出他们是很恐惧的。或许到处都是这个样子，她无从知道。而且，她不止一次感到他对她很感兴趣。她曾怀疑，他是不是警察。她甚至考虑过要问问他，因为她已具有城市人的那种胆量了。他的体格表明他是警察，他那有汗的衣服，挂在手臂上的那件根本没有必要带的象旧制服一样的雨衣，也表明他是警察。要是她的看法对，他是警察，那么，现在该是这些白痴终于要对许多偷窃活动进行打击的时候了。几个月来，这些偷窃活动简直使她无法进行盘点存货的工作。

这时，这个陌生人已盯着她看了一阵子，他现在仍在盯着她。

“不幸，我的背部有点痛，先生，”她终于慢吞吞地用发音清晰的法语向他吐露了真情。“痛的部位不是很大，但却痛得厉害。也许你是位医生？一位骨科专家？”

然后她又抬头看他，怀疑他是否有病，要是他有病，她的玩笑就开得不合适了。他的下颚和脖子闪烁着油光，他那没有生气的眼睛显示出心事重重的神情。看来他不是在看她，而是想自己的不可告人的某种麻烦。她要问他这件事——也许你在恋爱，先生，要么是你的妻子对你不忠？——她实际在考虑带他到一家咖啡馆喝一杯水或者大麦茶，这时他突然转身往后看，然后又回身从她的头上向街道的那一边望去。这时她想到，他真是害怕了，他不仅仅是在被搜寻，而且是吓得要命；因此，或许他根本不是警察，而是一个贼——虽然她

很清楚，这两者之间并无多大的区别。

“你的名字叫玛丽亚·安德列耶芙娜·奥斯特拉科娃？”他突然问她，好象这个问题使他感到害怕似的。

他讲的是法语，但是她知道，这不是他的本国语言，就象法语不是她的本国语言一样。他对她的名字的发音准确，而且把她的父名也说出来，这已使她注意到他的原籍。她立即认识到发音以及发音时的口型。她内心惊异不已，她认出她未能与之打招呼的这个人太晚了一些。

“要是这就是我的名字，那么你究竟是谁？”她在回答时间他，她的下颚突出，皱着眉头。

他向前靠近了一步。这时，他们二人的高度立即显得相差极大。这个人的相貌也立即显露出令人不愉快的特点。奥斯特拉科娃从她那很低的位置可以清楚看出他的恐惧与虚弱。他那有汗的下巴作了一个鬼脸，他歪扭着嘴巴，以显得他强大，但是她知道，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掩饰他那无可救药的怯懦。她心想，他象一个要使自己坚强起来以采取英勇行动的人，或者是采取一个罪恶行动。她心想，他这个人是完全不能自发地采取行动的。

“你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生于列宁格勒？”陌生人问。

大概她说是这样的。后来她又不肯定了。她看到他那感到恐惧的目光盯着开来的公共汽车。她看到他有一种接近于恐慌的犹豫不决的神情，她想到——从长远来说，这几乎是一种具有远见的想法——他打算把她推到公共汽车底下。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用俄语向她提出了下一个问题——而且是

用莫斯科官员的粗暴口音提出的。

“一九五六年，你被允许离开苏联去照顾你生病的丈夫，叛徒奥斯特拉科夫？还为了其它一些目的？”

“奥斯特拉科夫不是叛徒，”她打断他的话回答说。“他是爱国者。”她本能地拿起她的提包，紧紧抓住提包把手。

陌生人不顾这种反驳而直接讲下去，而且声音很响，以便压住公共汽车的响声：“奥斯特拉科娃，我带来了你在莫斯科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对你的问候，还有某些官方人士对你的问候！我想跟你谈谈她的事情！别上这辆车！”

公共汽车停了下来。售票员认识她，伸手要接她的提包。陌生人放低了声音，又讲了一句可怕的话：“亚历山德拉遇到了严重的问题，需要母亲的帮助。”

售票员喊她上车。他假装用粗鲁的声音讲话，这是他们开玩笑的方式。“上来吧，老太太！天太热，不是谈情说爱的時候。把你的提包递过来，我们走吧！”售票员大声嚷道。

公共汽车里发出了一阵笑声；后来有人大声讲了一句无礼的话——老太婆，干吗让我们大家等你！她感到陌生人的手在笨拙地抓她的手臂，象一个笨拙的求爱者摸索衣扣一样。她挣脱了。她想向售票员讲点什么，但是没能讲出来；她张开了嘴，可是忘记要讲什么了。她最多只能摇摇头。售票员又向她高声喊叫，然后挥挥手，耸耸肩。无礼的话多起来了——老太婆，大白天醉得象个妓女！奥斯特拉科娃留在原地，看着公共汽车开走，直到看不见它，她等待她的视觉清楚起来，等待她的心制止它的痴想。她想，现在我需要喝杯

水了。我能够保护自己不受强者的危害，但愿上帝保护我不受弱者的危害。

她一瘸一拐地跟他走进咖啡馆。正好二十五年前，在一个强迫劳动营，她踩到煤块滑了一跤，腿骨有三处摔断。在今天这个八月四日——她没有忘记这个日子——在陌生人带来的信息的极大的压力下，过去残废的感觉重新涌上她的心头。

这家咖啡馆是这条街上——如果不是整个巴黎——最后一个既无自动电唱机又无霓虹灯的咖啡馆，而且在八月份仍然开门营业，虽然一些弹子游戏台从早到晚都有人在那里打弹子。此外，还有上午十点左右通常有的喧哗声，谈政治、谈马以及谈巴黎人喜欢谈的任何其它事情的喧哗声；还有常在那里的三个妓女在低声讲话。一个身穿脏衬衫、满面愁容的年轻服务员领他们来到一个角落的一张桌子旁，这张桌子有一个很脏的牌子，说明它已被预定了。接着是一些可笑的陈词滥调。陌生人要了两客咖啡，侍者表示不悦说，哪有光为喝杯咖啡而在中午预定咖啡馆最好的座位的；顾客得付租费，先生。陌生人听不懂这些土话，所以奥斯特拉科娃不得不给他翻译出来。陌生人有点脸红，于是又要了两客火腿煎蛋外加油炸土豆，两客阿尔萨斯啤酒，他要这些东西时，根本未同奥斯特拉科娃商量。然后他前往男子盥洗室去恢复他的勇气——大概相信她不会跑掉。当他回来时，他的脸没有汗水了，蓬松的头发也梳了，但是，他们既已在室内，他身上的那股臭味就使奥斯特拉科娃想起了莫斯科地铁、莫斯科的电车和莫斯科的讯问室。他从男子盥洗室回到他们的桌子这一

段短短的路程，比他可能向她讲过的任何话语都更雄辩地使她相信了她已经担心的事情。他们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那种克制的狂妄自大态度，故意显示的残酷无情面貌说明了这一点。现在他把前臂沉重地平放在桌子上，以假装不愿意拿的样子从面包篮拿了一块面包，好象拿钢笔蘸墨水似的——这些情况使她回想起她作为一个蒙受耻辱的妇女在莫斯科恶毒的官僚的压力下生活时的最坏情况。

“好，”他说，同时开始吃那块面包。他选择了有硬皮的一头。象他那样的手，他能够马上把它弄碎，可是他却象贵妇人那样用他的手指尖从面包上一片一片往下剥，好象这就是正当的吃法。他在一点一点地吃的时候，他的眉毛上翘，好象对自己感到惋惜，觉得自己是在这个外国土地上的陌生人。“这里的人知道你在俄国过着不道德的生活吗？”他终于问道。“或许在充满妓女的城市里，人们并不在乎这一点。”

她的答复早已在嘴边上了。我在俄国的生活并不是不道德的，是你们的制度不道德。

但是这话她没有说出来，她保持着沉默。奥斯特拉科娃已经向自己发过誓，她既要克制她的急躁脾气，又要克制她的快舌头。她现在实际上责令自己信守这个誓言，她在桌子下面抓住她手腕里部的一块软皮，穿过袖子使劲捏住它。过去，在这种事情是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她这样做过一百次——上次你是在什么时候接到你的叛徒丈夫奥斯特拉科夫的信的？把你在过去三个月中所交往过的人的名字统统讲出来！她在自己的辛酸经历中，也从这种讯问中汲取了其它教

训。她的一部分思想此时正在重温这些教训。虽然从历史角度说，这些教训是整整一个世代以前的事情，可是她现在觉得很新鲜，好象就是昨天发生的，而且象昨天那样重要。这些教训是：决不要以粗暴对待粗暴，决不要被激怒，决不要责骂，决不要显得机智、优越或有才智，决不要由于愤怒、绝望或者偶尔提出的一个问题所可能产生的希望而改变方向。以迟钝对待迟钝，以常规对待常规。只能严守使她忍受住所有这些耻辱的两个秘密：她对他们的仇恨；她的一种希望，即有朝一日，在对他们软磨硬顶之后，她会磨损他们的意志，通过他们自己的繁复程序的一种奇迹，从他们那里获得被他们剥夺的自由。

他拿出一个笔记本。要是在莫斯科，这会是她的档案，但是在巴黎这里的一家咖啡馆里，它却是一本精致的黑皮笔记本，在莫斯科，甚至是一位官员，要是弄到这样一个笔记本，也会认为自己幸运。

档案也好，笔记本也好，开场白是一样的：“你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生于列宁格勒，名叫玛丽亚·安德列耶芙娜·罗果娃，”他重复说。“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你二十一岁，与叛徒奥斯特拉科夫·伊戈尔结婚，他是红军步兵大尉，母亲是爱沙尼亚人。一九五〇年，这个奥斯特拉科夫驻在东柏林，通过反动的爱沙尼亚流亡者的协助，背信弃义地叛逃到法西斯德国，把你撇在莫斯科。他在巴黎住下来，后来取得法国公民资格，他在巴黎继续与反苏分子接触。在他叛逃时，你并无此人所生的孩子。你当时也没有怀孕，对吗？”

“对，”她说。

如果在莫斯科，应当说“对，大尉同志，”或者说，“对，监察员同志”，但是在这个喧嚣的法国咖啡馆，讲这种客套话就不适当了。她的手腕上的皮已被捏得麻木了，于是她放开了手，让血液流通，然后又捏另一块皮。

“作为奥斯特拉科夫的叛逃的同谋犯，你被判处在劳动营监禁五年，但是根据在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逝世后发布的大赦令而获释，对吗？”

“对。”

“你回到莫斯科后，尽管你申请出国护照的要求不大可能被批准，还是申请了护照要去法国与你丈夫会合，对吗？”

“他患了癌症，”她说。“如果我不申请护照，我就没有尽到我作为妻子的义务。”

侍者端来了火腿煎蛋和油炸土豆以及两客阿尔萨斯啤酒，奥斯特拉科娃要侍者来一客柠檬茶，因为她很渴，但却不想喝啤酒。她在向侍者讲话时，试图用笑脸和眼色同他联系，但未成功。他的无情态度拒绝了她；她认识到，除了那三名妓女外，她是在这里的唯一女人。陌生人一只手象握着赞美诗集一样握着他的笔记本，一只手用叉子不断地叉东西吃。而奥斯特拉科娃则紧紧捏住自己的手腕，亚历山德拉的名字象没有止血的创伤在她脑子里跳动，她考虑了需要母亲的帮助的一千个不同的严重问题。

陌生人一面吃，一面继续谈她的历史。他究竟是为了享受而吃，还是为了不再惹人注目而吃？她断定他是健啖者。

“同时，”他边吃边说。

“同时”，她无意识地低声说。

“同时，尽管你假装关心你的叛徒丈夫奥斯特拉科夫，”他通过他那塞满了食物的嘴说，“你却同所谓音乐学生格利克曼·约瑟夫通奸，他是你在被拘留期间碰到的一个犹太人，此人曾由于反社会行动被判定犯了四项罪。你在这个犹太人的寓所跟他同居。对不对？”

“我当时是感到孤独。”

“由于你同格利克曼的这种结合，你在莫斯科的十月革命妇产医院生了一个女儿亚历山德拉。父母身份证是由格利克曼·约瑟夫和奥斯特洛科娃·玛丽亚签字的。这个女孩是以犹太人格利克曼的名字登记的。对不对？”

“对。”

“同时，你仍坚持申请出国护照，这是为什么？”

“我对你说过。我丈夫生病。我坚持申请护照是我的义务嘛。”

他又吃了起来，嘴张得大大的，她看到了他口里有不少坏牙。“一九五六年一月，作为一种仁慈行动，向你发了护照，条件是，把孩子亚历山德拉留在莫斯科。你超过了所允许的时限，留在法国，遗弃了你的孩子。对不对？”

靠大街的门是玻璃的，墙也是玻璃的。一辆大卡车停在门外。咖啡馆里暗起来了。年轻的侍者把她要的柠檬茶砰地一下放到桌子上，没有瞟她一眼。

“对，”她又这么说了，这次她设法看了看她的询问者，她

知道接下去会是什么，于是强使自己向他表明，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她是毫无怀疑的，也不懊悔。“对，”她以蔑视态度又说了一遍。

“作为当局赞同地考虑你的申请的一个条件，你在向国家保安机构作的保证上签了字。保证你在巴黎居住期间为它们执行某些任务。一个任务就是劝你的叛徒丈夫奥斯特拉科夫回到苏联——”

“努力劝说他，”她以微笑纠正了他的说法。“可是他不接受这个建议。”

“第二个任务是，你还保证提供有关复仇主义的反苏流亡分子集团的活动和人物的情报。你提供了两个毫无价值的报告，后来就再没有提供什么东西了。为什么？”

“我的丈夫看不起这些集团，不再同它们接触了。”

“你可以在没有他参加的情况下参加这些集团嘛。你在文件上签了字，却忽视在文件上作的保证。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你是为此而遗弃你在俄国的孩子吗？遗弃给一个犹太人？以便照顾人民的敌人、国家的叛徒？为此你忽视了你的职责？超过所允许的居留期，继续留在法国？”

“我的丈夫快要死了，他需要我。”

“那么孩子亚历山德拉呢？难道她就不需要你吗？难道一个垂死的丈夫比一个活着的孩子更重要？一个叛徒更重要？一个反对人民的阴谋家更重要？”

奥斯特拉科娃放开她的手腕，故意拿起她的茶，看着她

举在自己脸前的杯子，柠檬在表面上飘浮着。在它的那边，她看到了肮脏的拼花地板。在拼花地板那边，看到了格利克曼的可爱的慈祥的大脸。他极力要求她、劝她签字，要她对他们的要求的任何事情宣誓。他曾低声说，一个人的自由比三个人受奴役更重要，象我们这样的父母生的孩子在俄国是不能幸福的。不管你是留下还是走，都是这样，走了吧，我们将尽自己的最大力量跟着你去；在任何东西上签字，走，为我们大家而活着；如果你爱我，那就走吧……

“那时的日子仍是很艰苦的，”她终于对陌生人说道，差不多是用一种回忆的语调说的。“你还太年轻。甚至在斯大林死后，日子也是艰苦的，仍然是艰苦的。”

“罪犯格利克曼还继续写信给你吗？”陌生人用一种优越的、心中有数的方式问。

“他从未写信给我，”她撒谎说。“作为在受限制的条件下生活的持不同政见者，他怎么能写信给我呢？是我自己决定留在法国的。”

把自己说得坏点，她想；做可能做的一切来使仍然处在他们权力之下的人不受到伤害。

“自从我二十多年来到法国以后，就没有接到过格利克曼的任何信息。”她鼓起了勇气说。“我间接地得知，他由于我的反苏行动而恼火。他不想再认我了。在我离开他的时候，他内心里已想改造自己。”

“他没有写信告诉你们的孩子的事情吗？”

“他没有写。他没有发出信件。我已经对你讲过这一点

了。”

“你的女儿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

“你接到过她的信吗？”

“当然没有。我只是听说她已进了国家孤儿院，有了另外一个名字。我猜想她不知道我还在世。”

陌生人又用一只手吃起来，另外一只手拿着笔记本。他填满了嘴，嚼一下，喝一大口啤酒把食物送下。但是，他那种带有优越感的微笑并未消失。

“现在，罪犯格利克曼死了，”陌生人宣布，透露了他的一点秘密。他继续吃。

突然，奥斯特拉科娃希望这二十年是二百年。她希望格利克曼的面孔从未对她看过，她从未爱过他，从未关心过他，从未为他做饭，也从未在他只有一个房间的流亡居所天天跟他一起喝得酩酊大醉。他们曾在这个居所靠朋友们的接济生活，因为他已被剥夺了工作权，什么事不干，只是奏乐，作爱，喝得醉醺醺的，在树林中散步，同他们的邻居毫无往来。

“下次我进监狱或者你进监狱时，他们反正是会把她带走的，亚历山德拉总归已失去了，”格林克曼曾经说过。“但是，你可以拯救你自己嘛。”

“我到那里后，再作出决定，”她曾回答说。

“现在就决定吧。”

“等我到那里后再决定。”

陌生人把空盘子推到一边，又一次双手拿着那个精致的法国笔记本。他翻了一页，好象接近了新的一章。

“现在关于你那罪犯女儿亚历山德拉，”他嘴里含着食物说。

“罪犯？”她低声说。

使她感到吃惊的是，陌生人列举了一些新的罪行。在他这样做时，奥斯特拉科娃失去了她对目前的最后控制。她的眼在看拼花地板，她注意到大虾皮和面包屑。但是她的思想却回到莫斯科的法院，在那里，对她自己的审判正在重复进行，如果不是对她的审判，那么就是对格利克曼的审判——然而也不是对格利克曼的审判。那么是对谁的审判呢？她记得他们两人作为不受欢迎的旁听者参加过的一些审判。对朋友们的审判，即使只是偶然相识的朋友，例如对当局的绝对权力提出怀疑的人；或者对不被承认的某个神进行崇拜的人，或者罪恶地画了抽象派图画的人，或者发表了在政治上有危害性的爱情诗歌的人。咖啡馆中喋喋不休的顾客成为国家警察雇用的进行嘲弄的起哄者，弹子台上的撞击声，铁门的响声，也在起哄。一天，她由于逃离在某条街上的国家孤儿院而被拘留改造了多少个月。另一天，由于侮辱国家保安机构，又被拘留了多少个月，拘留的时间又由于品行不好而延长，接着又经历了多年的国内流放。奥斯特拉科娃感到胃在翻动，心想她可能生病了。她伸手去拿她那杯茶，看到了她手腕上捏的红印。陌生人继续列举她女儿的罪行，她听到她女儿由于不同意在某工厂就业而又被判处了两年徒刑，上帝帮助她，